

吉林市文史资料

第六辑

政协吉林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三月

目 录

政治军事

我早年在东北活动的片断回忆

——兼忆共过患难的一些朋友	楚图南	(1)
解放初期的舒兰	吴殿甲	(6)
田松部队解放舒兰	刘金凯 宫野进	(16)
清末三位“铁帽子王爷”	爱新觉罗·毓嶦	(22)
“老黑沟惨案”始末	徐庆山 张云龙	(25)
日本宪兵在磐石县的一次大逮捕	张帆	(30)
攻打磐石和烟筒山激战	书中	(36)
农民夺枪暴动记	李柏 赫长山	(45)
八道河子的一次农民暴动	安治国	(49)
歼灭空降特务	丁维玺	(51)
我知道的国民党吉林省干训团	梅香阁	(55)
桦甸的“集团部落”	王辉	(62)
双胜抗日轶闻	杨菊月	(65)

工商经济

吉林的参茸业	杨宝弟	(79)
聚盛兴铧炉始末	黄廷辅	(89)
日伪时期的“满洲开拓团”	马坤	(95)
✓记入侵上金马的“日本开拓团”	金恒	(110)
磐石石咀铜矿开办前后	朱常升	(115)
永吉缸厂记要	永吉县政协	(118)

文化教育

- 伪满吉林师范大学的片断回忆 张国振 (129)
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片断 李亚韩 (143)
长白师范学院片断回忆 张彻 (149)
国民党统治吉林市期间的一些报刊 马伯瀛 (176)
乌拉古城 永吉县政协 (187)
乌拉街“后府”话昔 尹郁山 (208)

社 会

- 解放前的牛马行 白山 (211)
吉林满族是怎样举办家谱仪式的 石文炳 张道森 (223)
解放前我的一家 邹宝福 (228)

我早年在东北活动的片断回忆

——兼忆共过患难的一些朋友

楚 图 南

我于 1925 年底到东北，找到东北特区党的组织，1926年春转为正式党员。

我离开北京到东北前，李大钊同志已移住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我看他，他说，东北很需要人，你可利用公开的教员身份多接触学生和青年，并团结文化教育界人士，接触人越多越好。李大钊同志还告诉我，可在青年学生和知识界中，宣传社会主义、苏联的十月革命胜利，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党的影响。在工作上，“广种薄收”，在做法上必须根据不同情况灵活应用各种不同策略和方式。

按李大钊同志讲话的精神，我到东北后，曾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女中等学校及在长春二师教书。并经常在吉林毓文中学、吉林一中、五中等校讲演，和学生联系，并组织读书会、学习会、

文艺会乃至举行演剧、体育活动等。

在这些活动中，我结识了谢雨天，他当时是长春二师的校长。他曾留学日本，思想进步且有正义感，我们一见如故。他大约也感觉到我的不公开身份，不过彼此心照不宣，不闻不问而已。我也由于谢雨天的关系，结识了在东北颇有影响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如赵雨琴、何靄人、胡体乾、张乃仁等，他们都曾掩护过我们的工作，使我们的工作能顺利展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后，关内一些同志被迫流亡到东北，如尚鉞、陈小航（后来笔名为罗稷南）、王复生、李扶人、郑效洵等。对这些同志，谢雨天都尽力通过各种关系安排职业和工作。这样，东北进步文化运动、青年运动有了新的蓬勃发展。“五四”运动前后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卖国统治的口号更加深入人心。

东北的青年学生是很热情爱国的。间或也许受到当时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更因为东北军阀政府对进步学生的压制，因此1930年吉林伊通县发生了学生砸毁县教育局的“特大学潮”案件。这件事发生时，我并不在伊通，参与其事的人，有从长春二师毕业到伊通县中学任教的郑健等人。当时伊通县中学校长是个参加过北伐的进步人士，对学生持同情

态度。

“学潮”案件引起了东北军阀政府的注意，并在1930年12月开始在东北各地对进步师生进行大逮捕。我当时在哈尔滨被捕，同期被捕的有在吉林五中的谢雨天、黄受天、卞楚樵，肖伯符（当时为吉林五中校长）、郑效洵（当时为吉林五中教员）、方秀春（五中学生）和在长春被捕的郑健等八人，一时成为东北的“共党要案”。后来因为反动当局找不到共产党的证据，就按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定为“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的要案，将我们以此罪名定罪、判刑。

我们被捕后，先后械押到吉林，由吉林的“军事法庭”审理。原伊通县中学学生黄受天（伊通事件发生后，逃到吉林五中就学）遭受严酷毒打，但反动当局始终没有获得“共产党活动”的任何口供。我和谢雨天等人在狱中也进行了斗争，敌人始终也没有抓到我们任何“共党活动”的证据。与此同时，谢雨天的一些朋友及社会关系也在各方面造舆论，表示声援，据说当时天津的大公报也有同情和声援的表示。在这种形势下，反动当局被迫将“军事法庭”拟判的死刑改为十二年以下的各种有期徒刑。

当然在狱中还有很复杂尖锐的斗争。后来谢雨天、郑效洵被保释出狱。他们出狱后，在外面仍然

积极从事营救和宣传。

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关东军侵占了东北全境。扶持溥仪登极，任伪满洲国傀儡皇帝，1934年6月曾经宣布“大赦”并清理监狱。我和黄受天、郑健被释放出狱，为避免敌人查觉再次被捕，我出狱后的第二天即由何露人的帮助和安排，回到北京。

总之，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初，我在东北各地的活动，党在文化教育界，在青年学生中的部分工作，是得到过谢雨天等这样一些开明进步的朋友的协助和掩护的。因此他们也受到了各种苦难和折磨，并和我们一起被关进监狱，一起被判刑。

他们出狱后，仍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东北的文化教育界起到积极进步的作用。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间或有过挫折，甚至错误和缺点。但是在解放后，他们有的出于自觉，有的则得到党和政府以及进步朋友的帮助，都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但是他们当年和我们一起工作、斗争、患难与共的经历却鲜为人知。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他们当中一些同志和朋友还受到过误解，经历过得不到公正对待的时期。

当年的进步学生中，有一些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在东北各地担任负责工作，这是应该为他们

庆幸和高兴的。但是对于那些在过去白色恐怖下和我们共过患难，但也有缺点、错误的朋友，更需要有人去理解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如同解放初期周保中同志帮助和关心过的胡体乾先生一样。我仅提供所记得的一些片断，供东北的同志们调查、核对、参考。

(黄绍岩笔记 楚泽涵整理)

1986年6月27日于北京

解放初期的舒兰

吴殿甲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至十月十二日，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在刘伯承、邓小平等指挥下，歼敌三万五千余，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之后，太行军区根据党中央的命令，组成了赴东北干部工作团，当时我被分配在三团。十二月初，我们太行军区赴东北干部三团到吉林省永吉县岔路河镇时，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张启龙、司令员周保中等领导同志接见了我们。随后省委和省军区任命我为舒兰县委书记、县长兼县保安团政委，任命原我团副团长吕士英同志为保安团团长，任命从华中解放区来的谢戬谷同志为县委副书记兼副县长。当时永吉地委书记袁任远同志介绍了舒兰县情况后，并布置了“在短期内迅速打开局面，建党建政，发动群众，肃清敌伪残余，清理敌伪资财，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建立人民武装和支援自卫战争”等具体任务。永吉地委又给我们三人配了九名干部，每人发了枪支。一九四六年的第一天，我们一行十二人分乘两辆胶轮马车从吉林龙潭山启程，当夜在乌拉街过了新年，第二天夜幕降临时，我们进了舒兰县城。

组建武装队伍

一月三日，由我、吕士英和谢戬谷三同志组成了中共舒兰县委员会。当时县临时民主政府代理县长解志一随军北征前，向我们交代了舒兰县的工作。

解志一同志，是田松部队政治处主任，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解放舒兰留下组建舒兰县临时民主政府的。在我们来舒兰前不

久，由晋察冀派的地下党组织，在舒兰组建的八路军舒兰游击队（后改县保安大队），除大部分编入正规部队外，其余组成了舒兰县大队和朝鲜义勇军。我们就以这两个分队为基础，派九名从太行山来的军队干部建立了舒兰县保安团，不久扩充到百余人，这是舒兰县人民政府第一支人民武装部队。县保安团设一、二两个营和一个含有骑兵排的警卫连。第一营以原舒兰县地下党组建的舒兰县大队为主，营长姚策、政委张文彩，下分三个连，一连长张珠，二连副连长李福增，三连连长尚志光；二营以朝鲜族义勇军为主，营长金中哲，政委金鲁钦；警卫连连长王清元，指导员杨保。吉林军区还给我们保安团派一个叫姚继周的任参谋长。这个参谋长原是张作霖委任的旅长，伪满时来到舒兰，熟人较多。军区派他来我团主要是帮助招兵。

舒兰县党政权力机构建立起来了，人民武装壮大了，下一步就是如何围剿被田松部队打散所潜逃到金马、开原、新安等东部山区约二千余人的敌伪警宪特股匪。

我们县委工作半个月后，吉林地委派刘鹏同志任县长和县委委员，加强了政府工作和县委的领导力量。当时我们分析了舒兰县形势，一致认为无论是发展生产，还是支援前线，都必须剿灭盘踞在东部山区的土匪，才能解除后顾之忧。剿匪的方针是：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最后以武力剿灭。经过口头宣传和向土匪亲属交代政策，出现了匪属写信劝和上山找的大好形势。到二月底，东部山区股匪只剩六百余，大多数当地人都回家务农了。

但是，当时盘踞在东部山区土匪仍然有青山好、三江好、上山好、五龙、海龙、双山、中平、四海、德山、古中华、金山等十一个绺子，严重阻碍我们支前工作。经请示上级，于二月底派出山东老部队二师六团来舒兰协助县保安团剿匪。为了阻击股匪向长春逃窜，六团蒋潮团长留下一个营做沿途阻击，只带第三营开进舒兰县城，一场剿匪战斗序幕拉开了。

杨木林子追歼战

一九四六年二月底，盘踞在开原、新安一带的股匪德山与海龙匪队聚集二百余人，在呼兰川上下搞杀人、放火、抢劫等破坏活动。县委决定对匪队进行追歼，为了达到一举歼灭的目的，我和保安团一营营长姚策带骑兵排和一连，绕过水曲柳跨过开原屯，在新安龙头山与蒋潮团长带的三营汇合。据侦察员报告，匪队仍驻小秀水河屯，我们骑兵下马、步兵下车，徒步通过一片原始森林，伏兵于小秀水河屯山脊上，不料匪队从长春来密报得知，“八路军来一团正规部队到舒兰剿匪”，而在我部来到之前乘坐马爬犁奔天德、莲花逃往舒、榆两县接壤的杨木林子屯。据此，我们当即决定组成三个梯队继续追歼，第一梯队是骑兵排，铁轮大车为第二梯队，步兵为第三梯队。

匪队沿途大肆抢夺百姓的好马和爬犁，在冰天雪地里他们可称“快速部队”了，而我们的战士凭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往返二百余里，终于在杨木林屯追上匪队。但是前头部队只有十余骑，而匪队后尾爬犁上有两挺轻机枪，子弹象雨点般地射来。追歼匪队的战士一听战斗打响了，都奋力前进。正当此时，六团二营向我们追歼部队发出了信号：西边阻击，东边追歼。追击到村子里已毙敌七十余人，其余匪队被压到一个有四合院墙，四角有炮台的地主大院里。当时我军一无火炮，二无攻城器材，只有围困，待拂晓再攻。午夜，敌人狗急跳墙，组织突围，被我军又击毙五十余人，其余残敌逃过松花江去了。这次战斗，我军共歼敌一百二十余人，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和马匹，我军战士牺牲二十多名。掩埋烈士后，我为英烈们写了墓碑，以让后人知道革命先烈抛头颅洒鲜血才换来今天的红色江山。

建设政权 支援前线

杨木林子追歼战结束，新建立的吉北地委、吉北专署、吉北军分区驻在舒兰县城。同时又给舒兰县配备了二十多党员干部，上级又派马国治同志任县委副书记。县委组建了组织部，李毅（女）为部长，组建了宣传部，吴英（女）为部长；县政府配备了科长；县保安团调来了副团长黄林、副政委钟鼎兴、参谋长任锡中、政治处主任林方生。全县建立了十三个区，各区都配备了区委书记、区长。建党建政基本完成，人民武装力量得到了大发展。边缘区都建立了区中队。还从县保安团、区中队抽出一部分兵力，组建有四百五十人的两个骑兵连，为正在围攻长春的主力部队输送了兵员。

一九四六年四月解放长春后，全东北解放区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是打好四平保卫战。我党东北局号召地方党政支援四平前线，我们县委、县政府以人力、财力、物力支援四平前线，各区满载军粮的大车每天不断地奔向火车站。我受县委和全县人民的委托，带两辆胶轮大车、六个同志组成了舒兰县战地慰问团。我们慰问团于一天晚上到达离四平不远的梨树县郭家店镇，这里是东北民主联军前总政治部所在地。副主任陈沂接见了我们，并准备第二天到保卫四平前线的新四军三师七旅二纵队去慰问。但午夜零点刚过，陈沂副主任轻声叫我：“老吴，起床，你们随军撤退。”我们中午到达公主岭找到原新四军七旅，向旅首长说明舒兰党政军民的心意，献上军鞋。当晚我们回到长春后，在吉林军区政治部，从警卫团政委、我的老战友李纲同志那里得知，军区正在组织保卫长春。我报名参加保卫长春，除把警卫员孟繁生留下外其他同志带车回舒兰。我在招待所刚刚睡下，李纲电话通知我，马上坐司令部的马车撤往吉林市。我同军区侦察队同车撤到吉林市后，吉林市一些党政机关也在准备撤退，我乘汽车赶回舒兰。回县后，县委刚接到东北局通知，令我们发动群众，在松花江右岸修筑工事，准备防御江西窜敌。我们

立即投入了构筑江防工程的战备工作。

整顿部队 准备打仗

一天早晨，我们三人在舒兰城南街遇到一台美式吉普车停下来，从司机旁边下来一位满脸灰尘的中年人。吴瑛上前问到：“是林彪同志吧？”那人点点头。吕团长同我向总司令敬礼后，他随我们回到团部。在洗脸中，我问：“总司令，敌人过江了吗？”他说：“过来咯，你们这也准备让他来，他要哈尔滨，我也准备给他。”团长吕士英、宣传部长吴瑛和我分析到敌人主力部队新一军、新六军侵占长春、吉林后，要继续过松花江北进，我军的方针又是把敌军放进来，舒兰县城正处于拉滨线上，所以提出用游击战阻止敌军北进的意见。林总摇头说：“我从山海关打起，没看到地方党领导人民开展游击战，因为东北人民正统观念严重。”我们意见是：我党在这里工作已达半年，人心开始向我，又有千把人的地方军队，全县有山地、森林、丘陵和平原，有抗日游击战争经验的三十多名党员。有了这些条件，我们是有信心发动农民群众，以人民游击战争战胜敌军的。说到发动群众他若有所思地说：“中央有指示要搞土改。”当时我表示不知道。他说：“东北局的领导就要来，你们先找那份指示看看。”接着说：“你们如果搞土改，发动群众，或许能开展游击战；你们做个计划，明天送给我。”当夜我们召开了区委书记、党员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开展游击战计划，决心整顿好部队，广泛发动群众，以游击战迎击国民党美式机械化部队的进攻。

第二天找来了党中央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颁发的土地改革文件。我让县委秘书韩艾瑛同志全文抄录，准备使用。然后，我同吕士英同志把开展游击战计划送给林总司令，他批准以后说：“现在主力部队困得很，要睡觉，待休息好再来打，象你们这座县城，只要有黄色炸药，就容易攻取。你们要在铁路两侧做好群众工作，发

展部队，巩固部队，按你们的计划，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当时为了实现开展游击战计划，最主要的是整顿好队伍，巩固队伍，作好一切准备工作。经吉林军区首长批准，从过路部队那里领来六百多支日本三八式步枪，此时吉林军区又发给二百六十支杂牌枪，一同配备给县保安团和区中队。随着部队的扩充，同时也带来了成份不纯的问题。尤其是国民党军队占领永吉县乌拉街后，问题暴露得更明显了。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叫保安团参谋姚继周连夜回县参加会议，但他当夜带两名警卫员三支短枪离开白旗屯过江投了国民党，并成立了所谓“姚团”。当时又出现了警卫连侦察班长刘金生带领全班十五人，携带全部武器叛变，把队伍拉到天德区石庙村刘家大院，报号“三江好”。一连排长袁扬士、李显庭先后带近三十余人过江投“姚团”，报号“五龙”和“占中华”。随之白旗区中队在叛徒副区长陈庆林策划下打死区长任庆春，区中队三十余人过江投“姚团”。据此，我们采取了阶级教育、形势教育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在稳定思想的基础上，从组织上清洗了危险分子，六月到七月全团减员二百八十余人。

正当我们刚刚整顿好县保安团和区中队时，占领乌拉街之敌，大肆宣扬要进攻舒兰，我们立即做好一切迎敌准备。由副书记马国治、县长刘鹏、副团长黄林、参谋长任锡中等同志带领县委、县政府的干部、保安团机关和一营全体战士到铁道东，发动山区群众继续剿匪，创建山区巩固游击区；我和吕士英指挥二营在铁西沿松花江右岸集中兵力，准备进犯之敌打阻击。此刻我与吕士英同志带三十余骑每天在舒兰县城早晚巡查一次，不仅安定民心，也对个别反革命暴徒是个震慑。

一天，一个自称中央军八十八师的家伙，从乌拉街给我打电话，问他的搜索营（侦察）到舒兰没有？我厉声回答：“来啦！你也来吧！我正在等你！”他一听我已有迎击准备没敢冒然进犯。事过几天，我民主联军一师和二师，在乌拉街、新站歼敌一个步兵

团，乌拉街守敌即忙于修桥头堡放弃对舒兰的进犯。

后来，吉北军分区曹里怀司令员赞扬我们说，有了打仗准备，敌人就不敢轻易进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们及时总结了准备打游击的经验，并表扬了积极发动群众做好战斗准备的西三区和开原区。

沙河子袭击战

一九四六年五月，国民党军先后占领四平、长春、吉林等城。与此同时出没于五常、蛟河、舒兰的东部深山老林的股匪，似沉渣泛起，他们东边放枪，西边抓人。为使东部山区人民免遭匪患，我们县保安团派出侦察班，捕捉敌迹。六月六日傍晚，我保安团获悉：蛟河县保安团一个排追歼从蛟河逃窜的伪治安队。伪治安队三百余人带五挺机枪、三具掷弹筒逃向我县金马与山河屯一带山区。我保安团一营两个连从平安出发，去金马、向阳山一带奔袭敌人。于六月九日八时我们在沙河子分兵两路从西、北夹击，敌撤到沙河子南山头高地，经一个多小时战斗，敌又撤入沙河屯，我部与蛟河部队怕伤群众而没有穷追猛打，敌人乘机入山逃窜。这次战斗击毙匪兵三人，伤五人，获步枪一支、马二匹及粮食机器等物。

清云寺围歼战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匪徒“四海”绺子窜到开原区永胜村西南岔老林。我保安团一营杨副营长带一个连急速进军西南岔。西南岔位于九顶莲花山西南，北山有座寺庙名叫“青云寺”，四面围墙坚固，庙门严紧。匪首李大炮指挥其三十余顽匪，龟缩在寺庙里。我杨营长指挥部队打开庙门后，警卫员与一匪徒对射同时中弹。杨营长一看警卫员负伤，轮开双枪冲进庙堂，当其击毙二匪徒时，杨营长为人民献出了生命。这场围歼战，共击毙匪徒三人，俘匪六人，缴步枪六支。其余匪徒逃入深山。

牛心顶子伏击战

六月二十日下午，获小城区密报，顽匪“青山好”一小队十余人窜入上营牛头山一带，当晚立即派保安团一连一排三十多名战士连夜行军七十多华里，于二十一日凌晨到牛头山屯。在当地群众协助下，把部队埋伏在去萝卜顶、正阳屯必经之路牛心顶子山头上，当“青山好”匪队入我部口袋包围圈时，当场击毙匪徒二人，击伤一人，俘获八名。缴盒子枪两支，手枪两支，子弹二十五发，布一匹。

青山堡战斗

开原区青山堡村，有户大地主叫张万麟，他家在平安、水曲柳等地开有十一处买卖，有熟地、山荒两千余亩。他为了继续剥削人民，在国民党侵占吉林乌拉街后，他企图迎接国民党进入舒兰，于是他把一些顽固地主网罗身边，又收集伪治安队残余七十余人。买枪积粮并加固了大院围墙，准备与人民政权为敌到底。我县政府几次派人与张万麟交涉，都被张拒之门外，更严重的是竟绑架我县保安团两名战士。当时我们决定由团长吕士英带两个连、两门炮于六月二十三日攻打张大院。当我部战士要主攻南大门时，恶霸地主张万麟指挥他豢养的炮手，向我部施放“母猪炮”，与我军对射。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小炮一响，院门顿开，我战士争先冲进大院。当场击毙十人，击伤八人，俘虏五十余人。后将张万麟枪毙于开原区。此后，恶霸地主纷纷“献”枪，表示愿为政府纳粮出钱。

发动群众扫清土改障碍

一九四六年，我党东北局七月会议刚结束，副书记林枫同志、城工部长李立三同志就急来舒兰，向吉北地委和舒兰县委传达了“七·七”会议精神。当时李立三同志向我们参加县扩大会议的同志传达文件时，还联系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实际。“决议”号召我们

从老解放区来东北的干部，脱下皮鞋，扔掉汽车，穿上便衣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此后，我们根据农民受地主剥削时间长和国民党部队虎视眈眈蹲在松花江西岸的实际情况，决定除现有部队保卫进行土改外，在开展土改的同时，建立农会和民兵自卫队。并明确规定农会领导土改，民兵自卫队不脱产不离村保卫土改。

农会普遍建立后，减租减息运动初步发动起来了。民兵监视地主，把那些与人民政府为敌的地主藏地契、宰牲畜、转移财物的，及时进行处理。但西三区有些地主企图过江勾结国民党部队，扼杀我减租减息运动于摇篮之中。当时鉴于沿江对峙情况，县委提出：“前门打虎，后门拒狼，武装保卫土改运动！”的口号。

正当减租减息运动轰轰烈烈开始时，叛匪姚继周在一天凌晨，把我白旗区东孤村民兵队长王德生的哥哥王德云抓去。当王文向我二营报告后，二营组织精干小分队追到西崴子村，经激战把“姚团”击败，救出王德云等人。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尔后“姚团”来偷袭白旗村时，有姓刘的几户大地主打着白色旗子暗地欢迎“姚团”，我白旗村民兵自卫队在县保安团配合下，一举击溃“姚团”，并惩罚了汉奸地主，给贫雇农壮了胆气。

土改、镇压反动地主和支前交错进行，哪项工作都不可偏废和疏忽。朝阳区双龙村几户地主与农会妥协分子勾结，绑架我土改工作队副队长王玉春同志和三名工作人员。区委书记武洪涛（女）同志带吉北军分区骑兵团一个连，不仅解救了土改工作队之急，并严惩了反动地主，从而打开双龙村土改局面。

白旗区区委书记李占魁同志常驻亮甲山村，这个村不仅是土改先进村，也是支前的模范村。一九四六年七月，前亮甲山村一次就有一百五十余青年参军，并编入保卫东北局的警卫团。